

對日共派遣代表團訪匪之研析

「在日本佔多數的保守勢力，固然是掌握着政權，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却被左派牽拉着走。」

——費里普·W·奎格

張棟材

一 此行的目的與任務

日本共產黨於二月初旬派遣了一個代表團訪問共匪，此一活動頗受日本國內及國際間的重視。其原因有二：（一）此一代表團係由日共總書記宮本顯治任團長，副團長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黨機關報「赤旗」總編輯岡正芳，團員則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員藏原惟人、米原昶，中央書記處書記砂間一良、中央候補委員上田耕一郎、上田健二郎、不破哲三、工藤晃等人，幾全係日共中央的高級幹部，為過去任何一次訪匪代表所未有；（二）日共已迭次公開指名蘇俄而對其修正主義加以抨擊，表明了追隨共匪的立場。值此蘇俄預定於三月末召開第廿三次俄共大會並將謀舉行世界共黨大會之際，日共派出由黨內實力者及理論家所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匪區，當然與其對蘇俄態度如何決定一事有關，其與共匪之會談，足以反映匪俄關係和日共對匪、俄關係的趨向。

日共代表團一行係於二月十日乘匪「紅旗號」輪船到達上海，共匪派了彭真、康生、劉寧一等匪酋迎接。其後，該代表團於十四日赴廣州，三日後又赴北越訪問。廿七日再折返南寧，廿八日至北平，受到匪方的盛大接待，會與劉少奇、周恩來諸匪酋連續舉行會談。及三月十一日，該代表團又轉赴北韓訪問，廿一日再折返北平。迄二十九日始離平首途返日。

從日共代表團這一連串的活動來看，很顯然地可以判別出它此行的目的與任務，除與上述第二點原因有關外，最主要的乃在於積極協力建立共匪所期待已久的「北平中心」，並圖藉此增長其在亞洲共黨陣營與日本國內的聲勢。

對日共派遣代表團訪匪之研析

日共正如世界各國——特別是亞洲諸國共黨一樣，隨匪俄對立衝突之發展，在內部分化為親匪與親俄兩派。近年來，日共為親匪派份子所把持，久已扮演著支持共匪向蘇俄爭奪亞、非、拉共黨領導權的角色。自號稱擁有三百萬黨員的印尼共黨因導演政變失敗，且傳首領艾地已被殺害而解體之後，便更增高了日共在共匪心目中的利用價值，以往所寄望於艾地的分工任務，因之也就轉撥到日共身上。即以此次日共代表團在宮本顯治率領下分訪北越與北韓而論；就可說是日共代替了印尼共黨所擔負的一種任務。蓋北越和北韓最近與共匪的關係，由於蘇俄以大力經援利誘，已有「輕微、緩慢但可以察覺得到的轉變跡象」，可能從對匪表現一點冷淡的搖擺中，來換取蘇俄的經援與合作。共匪為了挽回此一不利形勢，也就不能不先求有力的第三者出面關說。印尼共黨與艾地本人原是最合乎這樣第三者的條件，現在既已無法取得，自然就只有退而求其次的日共了。

共匪在此次接待日共代表團的節目上，會有極戲劇化的演出，如對該團的連續歡迎與歡送就在十餘次以上，計在上海兩次、廣州四次、南寧兩次、北平四次，每次都動員匪酋及各界千人「手執彩旗、花束、敲鑼打鼓，在機場上高呼中共和日共的戰鬥友誼萬歲」，這種露骨地過分製造舞台效果果的表演，就是要烘托出一種印象：讓人知道它對日共的重視和日共受它的驅策。在共匪對亞、非活動遭受一連串的挫敗中，能有日共前來捧場，共匪就大有難能可貴之感了。

二 日共追隨了共匪路線

日共在其所派遣之訪匪代表團尚未啓程之前，曾於二月四日在「赤旗報

「上刊登出一篇題爲：『爲了加強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國際統一行動和統一戰線』的長文。日本朝野對此頗多推測：認爲此一長文的內容，表明了日共「獨立自主」性格的主張，其發表之意義在於宮本總書記此次率領大批高級幹部訪匪，實有勸說共匪在越南問題上應與蘇俄採取統一行動的意圖，故先以此文作爲試探共匪反應的參考。迨共匪在其二月十一日號之紅旗雜誌載出「蘇共新領導奉行蘇美合作路線的供狀」一文後，日本朝野又在推測共匪發表此文適在日共代表團抵達上海之時，乃是對日共的二月四日一文所倡亦可引導蘇俄加入國際反美統一戰線主張表示堅拒的回答。

類似這種推測，大多都是由近似於斷章取義的錯覺而來，因爲先受了那些爲日共所強調「國際統一戰線的加強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等字句迷惑而有了不符合事實的判斷，所以才又爲該項判斷所左右而再從共匪的書資料上作斷章取義或僅望文生義式的求證。

日共的此篇長文，據日本治安當局宣稱，係經日共全國幹部會議討論所通過者，可代表日共最近之立場。它在對匪、俄關係的去從上已講得很明白：那就是繼續跟着共匪的路線走；在用着共匪的同樣字句辱罵蘇俄。故無論就任何角度看，全文內都尋不出所謂日共有別於共匪的「獨立自主」的理論行動。

誠然，日共也提出了要求共產集團加強團結的建議，但那是附有先決條件的，這就等於是要求蘇俄先行投降。如謂：「蘇俄領導對於恰好是現在需要採取『聯合行動』的中心問題——對美帝國主義的評價和同它鬥爭的問題，仍然沒有承認黑魯曉夫上台以來就主張的『美帝國主義向兩極分化論』和在此基礎上制訂的機會主義的『美蘇合作路線』是根本錯誤的。對於這些極爲明顯的根本性錯誤絲毫不作自我批評，却把對越南人民提供援助等——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應盡的義務，我們也希望這種援助會更多一些——作爲證據，企圖藉以強調他們從前就一貫堅持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立場，同機會主義進行不妥協的鬥爭，但是這能够使誰真正相信呢？」這和共匪在二月十一日號紅旗雜誌上發表的那篇文章所提出和蘇俄「聯合行動」的先決條件是相同的，這只能算是一種假定式的說法。共匪稱：「蘇共新領導還說，各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能把它們之間的分歧放在一邊，在反帝鬥爭中實行『聯合行動』，這怎麼能够取信於人呢？只要蘇共新領導不放棄黑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

，不改變蘇美合作路線，不取消蘇、美、印、日聯盟，我們就決不能同他們搞什麼聯合行動」。日共和共匪的這種共同的對俄態度，事實上已無異於說明了：它們雖然在推進國際反美統一戰線工作上竭力號召「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但並不意味着團結的對象也包括現在的蘇俄在內，因爲這個所謂「反美統一戰線」，實際上也夾帶着「反俄」行動。共匪對此已經多次毫無忌諱地公開道出了，日共的這篇文章在結論部份也更加重了此點：「現在，重要的是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者——它們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反帝，爭取民族解放與和平的國際統一戰線的主要危險——的機會主義和分裂主義的路線的鬥爭同加強反帝民主力量的國際團結的鬥爭正確地結合起來。」

關於推測日共代表團訪匪有「勸說共匪在越南問題上應與蘇俄採取統一行動的意圖」一點，由上述諸項資料爲證，可知其並無可能。日共和共匪對蘇俄都早已不存絲毫信任，它們對蘇俄援助北越一舉，亦只看做：「不得不在實際上採取一定程度的行動」（日共語）；「企圖增加自己的發言權，企圖挑撥中越關係，企圖幫助美國實現和談陰謀。」（共匪語）把蘇俄的一切都視之爲別有用心，這根本就無法談起日共居間拉攏匪俄的設想。再就所謂「日共的獨立自主的理論與行動」而言，這也是日本一般輿論所常見的一種流行論調，如果將其作爲對遙遠的未來的預測，也不能說絕無可能。不過，就現在而論，則缺乏實據。例如日共的此一長篇論文，曾涉及爲共黨集團論爭焦點的對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共黨會議聲明；和平共存；亞、非、拉民族解放鬥爭等的解釋問題，其論點無一不是抄襲了共匪的一套公式濫調。日共且一再歌讚共匪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取得的「勝利與成功」，並稱「要正確地學習這些經驗」，這却都是日共尊共匪爲領導的表現。共匪圖以「北平中心」對抗「莫斯科中心」的，也就是需要這樣的效忠表現。

三 日共與蘇俄間的死結

日共之捨俄就匪，固然是和北韓、北越兩共黨政權同一情形，有其在人事、地理上易與共匪相結合之條件因素，但最起決定作用的，恐怕還是由於日共的維持資金完全依賴共匪供應。

日共的對日貿易分爲「L.T貿易」及「友好商社」兩種方式進行，此在

利用日本內部矛盾以從事對日滲透工作的手法上，是有相當成效的。現日本「友好商社」之對匪貿易總額為一千一百二十億日圓，據日本治安當局推算：若由該總額中抽取百分之五充作日共經費，輕而易舉地即可有五六億日圓。這也不過是只說明日共維持資金來源之一例，事實上日共為配合共匪政治目的所需之活動費，共匪是能無限制地源源供應的。日本管制外匯僅管制對外匯兌，對匯入則是通行無阻，共匪利用此點，由香港銀行以私人名義匯交日共的私人代理人，乃是任何人無法知曉或可阻止之事。這在過去，如共匪支援松川事件被告、反安保鬥爭等，殆已早有前例。

日共捨俄就匪，且積極聲援共匪向蘇俄挑戰的另一原因，則是日本與蘇俄之間實存有一個難以解開的死結。

去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日共機關報「赤旗報」，曾刊出「關於蘇共領導和其領導下的組織和團體對於我國民主運動以及對我們黨的干涉和破壞活動」一文，列舉了蘇俄援助為日共所開除的親俄派份子志賀義雄、神山茂夫的活動事實，嚴厲斥責蘇俄這種支持「反黨集團」的「分裂主義行動」。在此次宮本顯治率領代表團訪匪、北越及北韓時，宮本於每次公開發表演說中，亦均提出「現代修正主義者竟然明目張胆地對不言從他們的政黨的內部問題進行露骨的干涉和破壞活動」來隱指蘇俄加以非難。本年二月廿二日的日共「赤旗報」又刊出了大致同於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該報所刊出一文之題目與內容的「再論蘇共領導及其領導下之機關團體對日本共產黨和我國民主運動的破壞」。這篇文章首先指出：「蘇共領導一面修談要努力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國際民主運動的團結原則，一面却對日本共產黨和日本民主運動進行干涉和破壞活動，這是自相矛盾，完全殘踏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行為。」繼而羅列了以下許多蘇俄打擊日共的新事實：

一、蘇俄幫助志賀義雄、神山茂夫等出版「新世界月刊」（近改名為「新世界雜誌」）、「國際」、「國際勞工資料」等雜誌，並給予政治指導，唆使其竭力詭譎日共理論、政策與活動。

二、蘇俄指使其御用羣衆團體以「聯歡」、「日蘇友好」等名義邀請了志賀等所組成的「日本之聲」作為一個團體正式參加去年秋在貝加爾湖畔舉行之「日蘇青年聯歡節」與「爭取日蘇友好與和平的哈巴羅夫斯克集會」。

三、本年一月間來日之蘇聯代表團團長伊凡諾夫，在日本國會與代表另

一「日共組織」之「日本之聲」的志賀、鈴木、神山等人公開舉行了會談。

四、蘇俄置日共於不顧，在儘量協助為日共視為反黨集團之個人及其組織出席「國際民主運動之會議」，並獲取「成員的權利」。

這便是橫在日共與蘇共之間的一個解不開的死結：日共親匪派將一些主要親俄派份子如春日、內藤、志賀、神山、鈴木等人排擠出黨外，稱之為「一小撮叛徒和墮落份子的集團」；把蘇共領導支持和鼓勵作為最大支柱的反黨集團；蘇俄對於這些被日共排擠出來的親己份子却將其看成為正統的日共代表者，處處予以支援，並打算扶植他們另建日本共產黨。在這種情形下，日共所面臨的已是生死存亡問題，在求生第一的抉擇中，它當然只有向正與蘇俄敵對的共匪作一面倒的依附。

日共與蘇俄之間的聯繫關係，現已演至近於斷絕的程度，除於一九六四年二月間會由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袴田里見等有過一次訪俄之行外，迄今整整有兩年期間，日共便從未派任何人再前往蘇俄。莫斯科的「真理報」和東京的「赤旗報」，則成為雙方互相攻擊的紙彈發射場了。

四 日共與共匪會談內容

宮本這次率領代表團到匪區作異乎尋常的長期訪問，並不辭辛勞僕僕風塵地奔波於北越和北韓，且在兩地各逗留達十日之久，更均特由該兩地折返北平，此足證與共匪有若干問題的會談，費時難決。從共匪的片斷報導中得知與日共代表團會談的匪酋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諸人，這是兩方的高層接觸。到今天雖並未見其對會談內容作過宣佈，但却有以匪俄關係為核心之共黨集團現勢的線索可尋，亦可想像得到他們所研商的不外是下列諸項問題：

一、照當前共匪及日共與蘇俄的關係論，是否應派遣代表團參加俄共第廿三次大會以及其利弊的問題；

二、如何於事前杯葛以期粉碎蘇俄計劃召開世界共黨大會以及由波蘭出面建議以支援北越為名而實為變相的受俄主宰的世界共黨大會問題；

三、由日共聯絡北越、北韓兩政權加強親匪共黨團結以決定建立「北平中心」步驟，並努力爭取亞、非、拉地區親匪共黨勢力問題；

四、針對蘇俄與日本政府接近以牽制共匪之謀略，共匪為加緊支持日共在日本國內之發展，對日共所擬定之策略方案應作如何具體協助問題。

這些問題都是從日共、共匪與蘇俄關係惡化所產生的困擾，在對付這些問題上，日共與共匪有着共通利害而必須在行動上趨於一致。前三項問題必然是日共代表團分訪北越、北韓時轉達共匪意見徵求同意的會談主題。

就第一個問題講：正執行反俄政策的日共與共匪自都不願再予國際間以「朝俄」印象而前往參加俄共大會，它們希望和自己站在一邊的共黨越多越好，阿爾巴尼亞是最早拒絕俄共大會的一個，但一向被目為親匪的北越、北韓却表示過要派代表與會，這當然會損及共匪的「聲威」。日共代表團之分赴北越、北韓，很顯明的是奉了共匪的意旨努力加以勸阻的。日共代表團雖未能在此一問題上達成共匪所交付的使命，但由於它已向共匪作了一面倒，却已為共匪增加了恫嚇作用。在第二個問題上，日共、共匪、北韓、北越則都是去年共同抵制過蘇俄所召開「三月會議」的「戰友」，基於這一個共同立場，共匪有其說服力與裹脅力。第三個問題是日共早已在進行的一項長期性的活動，日共的那篇長文「爲了加強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國際統一行動和統一戰線」，便是此項活動的理論基礎，是以反美爲號召來構築「北平中心」的司令台的。

最後是共匪如何協助日共在日本國內擴大發展力量問題。日共和共匪對當前的日本政府及日俄關係已下了定型的判斷爲：(一)認日本正致力於復活軍國主義，追隨美國的侵略亞洲政策和遏制共匪政策；(二)認日本蘇俄的友好合作趨向是美俄妥協下的共同圍堵共匪的行動。共匪與日共在此一

問題的會談中定有極週密的計議，最着重的將爲共匪竭力撮合日共和日本社會黨的聯合。日社會黨於本年二月間大會再度確定下佐佐木成田的人事領導之後，已有了向共匪伸手的跡象，這是正有利於共匪從旁導演的好時機。前此時，共匪忽然自動要求派代表團到日本和社會黨重溫定期政治會商的舊約，便是有該項企圖的一個反映。

五 結 語

共匪於三月廿二日正式聲明了拒絕參加俄共第廿三次大會，指其「背後另有動機」，這當是共匪、日共在此次長期會談中經過苦慮靜觀才作下的最後決定。所以接着日共也由東京的總部發出不參加俄共大會的聲明，日共在今後將變爲十足的「亞洲的阿爾巴尼亞」了，共匪必以最大的支援來交給它許多任務，充當共匪的有力走卒。

日共代表在匪區停留達近兩月之久，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是日共將給日本帶回來政治風暴的一項徵兆。目前的日本朝野人士倒是以日美安保條約的滿期之年競稱之爲「一九七〇年的危機」，其實，這危機很可能提前到臨，假如日本的反共態度依然徘徊於曖昧之中的話。美國「外交季刊」總編輯費里普·W·奎格在最近一期該刊中會發表批判日本的：「中立國」日本一文，他指出了「在日本佔壓倒多數的保守勢力固然是掌握着政權，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却被左派牽拉着走」。這幾句話道中了今天日本的矛盾和由此一矛盾產生的真正危機所在點。

共匪新文藝整風運動的發展

汪學文

一 五次大整風

匪黨宣傳部副部長周匪揚於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匪僞「全國青年

業餘文學創作積極份子大會」上指出：大陸文藝界對於共匪的文藝政策和方向，有的人是口頭上贊成，實際上反對；有的人是「真心贊成」，但是由於脫離羣衆，執行不力，因此自共匪竊據大陸以來，先後會進行了五次大整風